

“三治融合”重在公民规则意识的养成^{*}

黄素梅

摘 要 | “三治融合”贵在融。规则是法治、德治、自治的核心要素，规则意识是最基本的法治意识，是德治的基本条件，是自治的必要条件，良好的规则意识是“三治融合”的基石，乡村治理、法治社会的建设应重在养成公民的规则意识。规则意识淡薄导致知法犯法现象屡见不鲜，不利于“三治融合”与法治社会的建设。应通过养成教育、制度约束、激发内心道德义务感及普法宣传等形成合力，培养公民良好的规则意识，将自治、法治与德治融为一体，优化乡村治理，推动法治社会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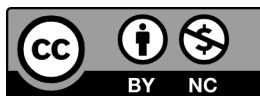
关键词 | 三治融合；规则意识；法治社会；乡村治理；乡村振兴

作者简介 | 黄素梅，湖南娄底涟源人，法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国际法、法学教育。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贵在“融”，其核心目的是建立良好的乡村秩序，而规则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前提和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注重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

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1]。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中，全民守法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是三治融合的具体表现，而公民良好的规则意识是全民守法的基础。公民规则意识强，自觉守法遵法，

^{*} 本文是 2020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卓越计划 2.0 下我省法治人才培养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HNJG-2020-0513]”、2021 年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湖南省‘诉源治理’机制研究 [21C0325]”阶段性研究成果。

[1]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10/c_1120093133.htm，访问日期：2018 年 4 月 20 日。

社会法治化程度就高,反之则低。因此,规则意识的培养是公民自治、国家法治与德治融为一体的重要因素;或者说,法治社会的建设、“三治融合”重在公民规则意识的养成。

一、规则是法治、德治、自治的核心要素

规则,又称规范,是指具体规定权利和义务以及具体法律后果的准则,或者说是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具体后果的各种指示和规定^[1]。从根本上说,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规则只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规则也就是行为规范,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比如我们经常面对的交通规则、课堂规则、工作守则等等。平常人们常说的“规矩”,就是规则的通俗表达。

在由人组成的社会里,众多人的集合除了衣食之外最不可缺少的恐怕就是规则了。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无一不依赖于规则。古人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是这个道理。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肌体中,规则就是筋和骨^[2]。社会生活中的规则是多种多样的,但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规则,另一类是社会规则。技术规则用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规定人们如何使用自然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通常所说的操作规程、技术规则即属此类。社会规则即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政策、法律、道德、社会习俗等等均属此类。

总的来说,社会生活中的规则可以分为习惯规则、道德规则、法律规则等不同类型。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习惯有多种含义,此处是指长时期里形成的、一时难以改变的行为、倾向或社会风尚。道德是一种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根据人们的需求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它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往往流传较为广泛,形成共识。而法律规则一方面要反映并实现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习惯等,另一方面还可以反映并实现技术规则,某一技术规则一经被法律所确认就成为法律规则,具有法的约束力。按照法学的普遍认识,法律最核心的要素就是规则。法是“一种纯粹的规则或规范体系”^[3],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则体系^[4]。相对于习惯、道德等

规则而言,法律是效力层次最高的规则或规则体系,位于现代社会规则体系金字塔的顶端。可以说,法就是规则,是最重要、最基本、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规则。

在法治中国建设“三位一体”格局中,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前提。法治社会必然是全社会对法治普遍信仰、宪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及普遍遵从、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社会。“三治融合”强调的是自治、法治与德治,是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抓手;无论是法治、德治还是自治,都离不开社会规则,社会规则是法治、德治与自治的基本、核心与共同要素。

二、规则意识是“三治融合”的必备条件

规则意识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是指人们遵循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必要规则的自觉的意识、观念和心理状态^[5],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以规则为自己行为准绳的意识。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掌握关于规则的知识;二是将遵守规则变为自觉和习惯;三是遵守规则已经成为人的内在需要。公民规则意识的高低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法治社会进程。因此,公民良好的规则意识是“三治融合”建设顺利推进的必备条件。

(一) 规则意识是最基本的法治意识

从法与规则的关系来看,法治社会首先是一个规则社会,但并非具有了良好的规则,法治社会就自动建成,无论哪种规则,都要由具体的人来制定、运用和执行,而人们的行动,无疑是由自己的意识来支配的。有了规则,还必须使全体社会成员具有

[1] 张文显:《规则、原则、概念——论法的模式》,《现代法学》1989年第3期。

[2] 人民日报评论部:《培育深入人心的规则意识》,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1114/c1003-30398869.html>,访问日期:2019年7月6日。

[3] 严生存、郭军明:《自然法、规则法、活的法——西方方法观念变迁的三个里程碑》,《法律科学》1997年第5期。

[4] 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9,第114页。

[5] 焦国成:《现代规则意识与社会文明》,《伦理学与道德教育》2006年第1期。

规则意识。从整个社会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规则是否良好”;但如果没有良好的意识,再好的规则也难以得到普遍的执行,规则被架空,社会就会处于无规则状态,公共生活也就无法正常运行^[1]。对规则的体验、认同、遵循形成了人们的规则意识,其深层内涵就是诚信、节制、责任的伦理精神和民主、法治、正义的法理精神。

规则意识是法治社会的基础。从本质上看,规则意识在天性上就反对无规则,反对特权,反对潜规则和暗箱操作,是以公开、透明、平等现代价值观念为价值基础的,这也与现代法治意识不谋而合^[2]。规则意识是最基本的法治意识,在法律实施中,法律观念、法律意识起着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在法律观念、法律意识中,规则意识则是最重要的归结点^[3]。作为守法主体的公民,从幼稚到成熟,从幼年到成年,从无知到熟知,对法律的信仰是从不断接受、实践规则开始的^[4]。公民对法治的认同及对法律的遵守建立在守法意识和守法习惯基础之上,而守法意识和守法习惯的形成,有赖于规则意识的培育和养成。只有规则意识才能夯实法治建设的土壤,所以有学者呼吁“行政执法中需要规则意识,司法活动中需要规则意识,法律监督中需要规则意识,公民守法更需要规则意识。”^[5]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5]。因此,良好的规则意识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是全民守法的基础,是法治文化的基础,能降低法治建设的成本^[6]。

(二) 规则意识是德治的基本条件

德治,就是以道德和礼教约束民众,我国古代早就认知到德治的重要性了。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政令来训导,用刑法来整治,老百姓知道避免犯罪,但并没有自觉的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治,老百姓就会有自觉的廉耻之心,并且心悦诚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现代德治是在法律对公权力进行约束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框架下,即在确保法律对公权力制约的前提下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品德情操与社会道德教化^[7]。简言之,现代德治的核心规则是道德与礼教。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人的行为是由意识

支配的。公民的道德修养、品德情操除了与客观的法治环境相关外,最根本的就是其内心的意识,即公民的心理状态和规则意识程度。具体而言,个人的法律意识、道德水准、知识水平、文化程度等都对守法产生重要影响。而对于公民道德教育来说,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意识是否良好”。因为有些规则蕴涵着道德的内涵,是否遵守规则,体现出公民的道德水平和社会公德意识的强弱,所以规则意识的有无、强弱,直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一个人的道德情操与做人的水准。如果我们对基本的社会、生活等规则视而不见,不予遵守,随意破坏,那么意味着社会公德意识差,公民的规则意识及道德义务感不强。

总之,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以德治国、以德治民,即用道德作为控制和评价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手段。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建成,当然可以借力德治,主要通过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制定乡规民约和宗族家法、舆论褒贬等形式实现。而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乡规民约、宗族家法无一不是规则的体现。因此,良好的规则意识是德治的必备条件。

(三) 规则意识是自治的必要条件

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中,“自治是最基

[1] 赵修义:《法治社会为何要强化规则意识》,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103/c40531-26314546.html>, 访问日期: 2021年9月16日。

[2] 陆长庆:《当代中国公民法治意识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方工业大学,2010,第5页。

[3] 刘作翔:《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战略转移:法律实施及其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2期。

[4] 张益刚:《家教语境下的法信仰障碍分析——从规则意识的培养谈起》,《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5] [美]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第222页。

[6] 刘大勇:《论规则意识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7]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笔:王淑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意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1011/c40531-31393076.html>, 访问日期: 2020年7月30日。

本的制度安排,法治、德治分别是自治的原则与特色,共同制约和规范着自治的运行。”^[1]自治指的是治理主体在合适的治理结构中依靠治理规则自主进行乡村治理,这里的治理规则既包括正式规则,即法律规范、政策规定等;也包括非正式规则,即乡规民约、群众性组织规则等在乡村约定俗成的治理规范^[2]。简言之,自治的本质就是村民按照法律法规、村规民约、道德规范等规则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在推进乡村治理中,据报道,留坝县实施“一会一屋一规”推动乡村道德建设常态化。“一会”即村道德评议委员会,“一屋”即德美屋,“一规”即村规民约。各村组建“道德评议委员会”,定期对农户环境卫生、精神面貌、好人好事和失信、失范、失德等遵守村规民约情况评议赋分、“红黑榜”公示^[3]。这种农民自己管、自己办的治理方式中,要想取得满意的效果,规则意识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良好的规则意识也是公民能够自我管理即自治的必备条件,如果公民的规则意识不强,那么乡规民约形同虚设,法律法规将被熟视无睹,道德规范不予遵从,村民自治也就不可能实现。若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有良好的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治理路径与成功经验表明,要培养公民的规则意识,弘扬道德规范,使其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三、规则意识缺失阻碍法治社会“三治融合”建设

“三治融合”的价值追求主要在于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并贯彻群众路线;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农民生活获得感^[4];其乡村治理体系基本表现为“自治为本、德治为基、法治为要”的关系结构^[5]。公民具备规则意识是遵守法律的基本条件,对乡村自治、建设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我国公民规则意识缺失的主要表现

就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来说,在利用技术手段加强执法监督效率的同时,还需要让人们更多地像对待道德规则那样对待社会规则,哪怕戴上了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说的“吕底亚的牧人的戒指”,可以为所欲为而无人发现,也会受自己良心的监督,也会如古人所说的“慎独”,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然而,在建设法治中国道路进程中,部分公民遵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究其根源,实乃规则意识淡薄或缺失所造成。

我国公民规则意识缺失的主要表现是缺乏诚信、程序不正当、合法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积极守法精神不足和权利滥用等。没有规则意识的人,极容易损害他人利益甚至危害他人生命,尤其是当没有规则意识的人有了权势之后,更是容易为非作歹,许多黑恶势力都是没有良好规则意识的。没有规则意识的人不敬畏法律,常知法犯法。没有规则意识的人崇尚“潜规则”。法治国家之内,任何人、任何事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但无规则意识的人,往往法治意识淡薄,拜金主义思想严重,崇尚权利,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极端个人主义。他们无视生活中的各种规则,对规则视而不见,热衷于“潜规则”。符合法治精神和道义基础的显规则被驱逐,破坏法治精神和道义基础的潜规则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异和扭曲,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6]。目前不少人的这种“潜规则”意识非常之强,导致漠视规则、蔑视法律的恶果不断产生。路霸、村霸等农村黑恶势力往

[1] 张文显等:《“三治融合”的桐乡经验具有独立价值》,《治理研究》2018年第6期。

[2] 左停、李卓:《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构建乡村有效治理的新格局》,《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3] 马洁:《自治德治法治——留坝县实施“三治融合”加强乡村治理侧记》,《汉中日报》2019年11月23日,第1版。

[4] 张明皓:《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5] 向此德:《“三治融合”创新优化基层治理》,四川党建网: <http://www.scdjw.com.cn/article/51830>,访问日期:2021年2月11日。

[6] 吴恒波、岳翠云:《论中国社会规则意识的有效建构》,《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

往规则意识淡薄。

（二）公民规则意识缺乏不利于“三治融合”

我国公民现有的规则意识状况，反映出道德水准不高、公德意识弱，譬如《民法典》中“侵权责任”编中第1254条规定了“不明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责任”，对高空抛物坠物治理规则进行了完善，而纵观西方各国民法典，如德国、法国等，极少有这样的规则，因为在这些国家，高空抛物的行为几乎不会发生，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公民的规则意识也远远高于我国，如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公民规则意识都很高，我国公民的规则意识较弱，将高空抛物治理入法实际上是不得已的选择，这也说明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任重道远。

乡村治理中，虽然法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法和手段，但许多时候，基于乡村邻里关系的特殊性，乡村情感的紧密和复杂性，“德治”将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德治”的核心要素是道德规范，这些规范的遵守完全出于公民内心的信仰和自觉自愿。无论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形成积极向上的风俗习惯，无论是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还是树立道德模范，都需要公民有较强的规则意识。如果公民规则意识弱，则很多时候也会践踏道德规则，造成乡村邻里不和谐、不协调、纠纷多，如果对道德规则置若罔闻，难以发挥德治的价值与效果，乡村价值认同和凝聚力难以形成。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群众基础，“自治”是乡村治理中的优选方式与方法，乡村“自治”领域与范围主要体现在建立健全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和监事会等自治载体，突出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倡导以村民为主的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协商和决策，充分调动村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积极性，提高村民的自治能力和水平。这需要村民具有较强的规则意识，否则就谈不上乡村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乡村事项难以实现“自治”。因此，只有公民具备了较高的规则意识，才会发自内心地遵守乡规民约，才会自觉自愿地遵守道德规范，才会理所当然地遵守国家法律，乡村振兴战略才能真正实现。

此外，在乡村治理中，应发挥各级党组织尤其

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作用，党员要有良好的规则意识，带头遵法守法，树立法治信仰，弘扬法治精神，同时，必须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1]。在“三治融合”创新乡村治理中，如果党员没有较强的规则意识，则难以引领村民走上自治之道、德治之道、法治之道。

四、“三治融合”中规则意识养成的基本路径

公民规则意识的培养是建设法治社会、推进“三治融合”的基本前提，培养和提高规则意识，需要国家、社会、个人积极配合，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氛围，为培养和提高公民规则意识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适宜的土壤；尤其是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经济飞速发展，农村治理创新的当下，使得规则意识的培养迫在眉睫，成为当务之急。可以从养成教育、制度约束、道德义务、社会宣传等方面着手，采用传统和新型方式、方法与手段如网络、自媒体等培养规则意识，推进乡村综合治理，建设法治社会。

（一）养成教育是培养规则意识的基本途径

养成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家庭、学校在养成教育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首先，家庭是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课堂，每个家庭都应重视孩子规则意识的培育与养成。父母的言行与家庭教育对孩子及其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父母应成为孩子守规则的榜样和典范。父母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心智、学识等具体情况，循序渐进地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进行规则意识的养成训练。指出孩子日常行为中违反规则之处，切不可抱着“孩子还小，长大了自然知道”等想法，现实生活中的“熊孩子”之所以层出不穷，主要就是家长、家庭没有对他们及时进行规则意识的培养。古人云“小时偷针，长大偷金”，足以见得，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表明，规则意识应从小时、从小事进行培养。一个人如果从小遵守规则，长大了自然遵守法律。

其次，学校应加强对小学生规则意识的培养。学

[1] 易卫中：《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本质特征》，《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校教育是规则意识教育的主阵地^[1]。规则意识的培育与养成,是法治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指出,法治教育应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法治知识课程的开设,应考虑受众的年龄、心理、情感、知识层次等特点。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知识层次的青少年,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应该有所差异。就中小學生而言,法治教育主要是培养规则意识。当然,教师要以身作则,遵守各种规则,为学生树立榜样。目前学校教育存在重视理论说教,忽视实践养成的问题。应强化实践教学、案例教学、讨论课等教育方式,适当组织学生到社区参加法治宣传与建设活动,到劳教所接受警示教育,到法院参加旁听,参观监狱,讨论典型案例,观看交通违规肇事、环境污染与保护纪录片等等,切身体会违法违规所带来的不利后果;重视实践教育,通过良性互动的实践使孩子达到对规则、法律的“内在认同”。通过课堂内外的学习、实践,加强规则意识的培育和养成。

(二) 制度约束是养成规则意识的重要保障

养成教育是培养规则意识的基本途径,但是并非所有人通过教育就可以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少数人面对规则往往明知故犯,明知规则就在那里,但就是不遵守,将规则当成摆设,如司机并非不知道酒后不能开车,成年人并非不知道红灯禁行等等。因此,当教育失灵时,需要通过制度约束来加强。德国规定,司机每驾驶两个小时就必须休息一次,而且每天开车不得超过十小时。车上装有自动记录仪,将开车时间、休息次数、休息时间都记录下来,如果司机违反规定,就可能工作不保。上海推行垃圾分类新规,如果违反规定,不加区分将垃圾混在一起,则垃圾会被禁止收取,户主可能被开罚单或警告。由此可见,人们规则意识的培养离不开好的制度,在进行养成教育的同时,加强制度的约束,久而久之遵守规则就形成了习惯。

我国2013年新的交通法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应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违反规定,如属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或危险物品运输车的,扣12分,属其他机动车的扣6分。相比之前,疲劳驾驶的情况尽管还存在,但明显减少了,正是加强了制度约束的喜人效果。2011年5月1日,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醉酒驾驶将作为

危险驾驶罪被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据公安部数据统计,3年多来,全国发生涉及酒驾、醉驾导致交通事故的起数和死亡人数较“醉驾入刑”前同比分别下降25%和39.3%^[2]。违反交通法规制度约束的加强,有力地强化了人们的交通规则意识,是一件拍手称快的事。其他领域也应借鉴这种做法,完善制度约束,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大违规、违法行为的成本,有效防止逾越雷池、践踏规则的行为,将人们的规则意识内化于心。

(三) 激发道德义务感是养成规则意识的关键步骤

用康德的话来说,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其尊严是与其遵守普遍法则的能力和意志相联系的。是否知道“规则”是什么意思,是否知道“遵守规则”是什么意思,是否愿意遵守一条他知道其意义并认为有效的与己有关的规则,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通过外部的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或多或少会有所改变。但是规则意识的养成不能仅满足于人们在行为上有所改变,还需要让人们内心上有所认同,需要使人们在内心深处把公共生活中的规则当作一条道德规则来对待,使社会普遍将规则意识强弱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衡量一个人做人的境界高不高的标准。

从而使社会普遍认识到,如果规则得到遵守的话,行动者会为自己的行动感到心安理得和自尊自信,行动者所属团体的其他成员及其代表会对他表示赞许和褒奖。如果违反了规则的话,行动者自己会感到内疚和羞耻,他所属团体的其他成员及其代表会表示谴责甚至对其予以处分。这就需要激发人们内心的道德义务感或责任感,让人们们对规则怀有敬畏之心,自觉尊重规则,而不是总想着如何去规避规则或者寻找规则的漏洞。规则确实是约束人的,但只有人是可以利用规则来约束,而不必用绳索、栅栏或围墙来约束的。当个体真正形成规则意识时,

[1] 刘伟、李哲:《大学生规则意识的缺失及培育对策探析》,《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5期。

[2] 张洋:《醉驾入刑有效果,法治入心显力量》,人民网: <http://legal.people.com.cn/n/2014/1020/c42510-25864219.html>, 访问日期:2018年5月9日。

一个违反规则的行为就会让他认识到错误所在，并因而产生负罪感或愧疚感；看到他人违反规则而产生一种义愤感^[1]。这对于规则意识的养成来讲，是重要的一环。

（四）强化社会宣传促进规则意识的养成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社会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规则意识的养成，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整个社会应该营造一种遵守规则的良好氛围，弘扬正气，摒弃歪风邪气，形成守规则光荣，违反规则可耻的评判体系；要进行正确的利益诱导，鼓励遵守规则的人；党员干部要带头守规则，做到不逾规、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为社会树立遵守规则的榜样。对违反党纪国法的人，应严格按照规则、法律的规定予以处罚。我们的社会必须弘扬规则意识，传播遵守规则的正能量，加大对规则意识养成的正面宣传力度，以维护、巩固和强化公民的规则意识。

首先，大力宣传规则至上、法律至上。加大对遵守规则、遵守道德、遵守法律的宣传和弘扬力度，强化规则、法律的权威性，提倡按规则办事、按道德处事、按法律行事，倡导各行各业积极、主动厉行规则和法治。传播公平、正义、平等、法治等理念，加强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遵守规则光荣、遵守道德光荣、遵守法律光荣，违反规则可耻、违反道德可耻、违反法律可耻，崇尚美德、惩恶扬善的社会氛围。

其次，优化普法宣传。普法的精髓应该是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培养广大公民的法治意识，树立其法治信仰，而非使公民熟记法条内容，这既不现

实也无必要。普法必须与公民意识培育、契约文化建设相结合，培育法意或认同感^[2]。只有将法治观念牢固树立于公民心中，才能使之在现实生活、工作中遵守法律，遇到问题能够想到利用法律来解决，找法律专业人士寻求法律服务。如果公民有了这种法律意识和思维，就是普法的最大成效，普法的终极目标也将得以实现。除了传授法律知识，普法时更应重视实践教育，通过良性互动的实践使公民达到对法律的“内在认同”。“普法的方式早已不再是‘法律知识’的‘下达’——寻求一种‘合意’的法律知识，实现立法者、司法者、政府、民众间法律信息的沟通与反馈，才是普法的正确方式。”^[3]

再次，正确利用网络、自媒体等新媒介。媒体是传播信息的专业平台，尤其是互联网的急速发展，网络的普及和各种自媒体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快捷、形象、生动，互动性强，对公民的价值观、规则意识、情感等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应利用好这些新的媒体和介质，面向各种不同年龄、不同知识结构的人群进行各种合适形式的普法宣传。

总而言之，规则是法律、道德等的核心要素，规则意识是法治意识的根本，是加强德治、实现自治的重要心理与情感因素。公民对法律的遵守，并非主要取决于法律知识的占有及其量度，而主要取决于他们对法律信任感的确立^[4]，取决于规则意识的强弱。规则意识应从小培养，从小事实，内化于心^[5]。只有公民养成了良好的规则意识，法律才能真正被遵守，卓越法治人才才能有更好的社会培养环境，“三治融合”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社会才能最终建成。

[1] 周兴国：《公民的规则意识与培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2] 李安、王家国：《法律移植的社会文化心理认同》，《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

[3] 吕明：《在普法与守法之间——基于意识形态“社会黏合”功能的意义探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4] 曾明生：《守法教育学论纲》，《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

[5] 王晓烁：《论法的形式正义与守法》，《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